

中国经济学界一代宗师陈岱孙系列书



晏智杰
唐斯复
编写

福建人民出版社

学术精要与解读

陈岱孙

他永远平和从容
没有轰轰烈烈
他的影响来自于
人品学问的高大



代 序

弦歌不绝，道德文章

——深切悼念陈岱孙老师

厉以宁

(北京大学教授)

—

当我听到岱孙老师噩耗时，几乎不能相信这是真实的消息。的确，这太出人意料了。记得两年前，当我们为他老人家祝贺 95 岁生日时，他的身体竟是那样健朗，说话时思路清晰，大家都预祝他活到 100 岁以上，并且准备在 2000 年他百岁华诞时隆重举行盛典。但谁能料到，今年 7 月 27 日他竟与世长辞。据说，在赴北京医院住院时，他还不需要别人搀扶，他是自己拄着拐杖走进去的。毕竟年龄过大了，从此他同我们永别。

岱孙先生是 1953 年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的。在这以前，他担任中央财经学院副院长之职约一年之久，再以前，他在清华大学经济系任教达 25 年。也就是说，他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后，就到清华大学，一直到 1952 年院系调整，清华大学撤销经济系才离开。岱孙先生来北京大学后，到现在已有 44 年，他在北大的教龄超过了在清华的教龄。无怪乎他时常对我们说：“北大清华都是我的母校，我是清华人，也是北大人。”

岱孙先生 1953 年来北京大学经济系任教时，我是三年级学生。他担任经济学说史课程的教学。这是一学年的课程，他和他

的学生徐毓楠教授共同任教。古代希腊、罗马经济思想、中世纪经济思想、重商主义部分由徐毓楠先生讲授；重农学派、古典学派以及从萨伊到马歇尔的各派经济学说，由岱孙先生讲授；凯恩斯学说则又由徐毓楠先生讲授。徐毓楠教授是岱孙先生的高足，不幸于1958年病逝。此后，经济学说史就由岱孙先生一人长期主讲了。凡是听过岱孙先生讲课的学生们都有一个感觉：艰深难懂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经过岱孙先生的讲授，变得易于被人们所理解，例如关于魁奈的《经济表》的来历与含义，经过岱孙先生的讲解，很快就被学生弄懂了。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那些年内，岱孙先生讲授的经济学说史是北大经济系最受学生们欢迎的一门课程。

岱孙先生一直担任教学工作。临近90岁之际，他才不亲临讲坛，但仍在家中给博士生、硕士生、青年教师面授，解惑释疑。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经济学的教学工作。他是一位受到人们尊敬的长者、教师。在1990年为他庆祝90岁生日时，我代表受过他多年教诲的学生们向他献上一首词，以表示我们的敬意。

秋 波 媚

贺陈岱孙先生九十寿辰

忧国少年越重洋，回首几沧桑。人间早换，武夷更秀，闽水流长。弦歌不绝风骚在，道德并文章。最堪欣慰，三春桃李，辉映门墙。

二

岱孙先生早年留学美国，对西方经济学说有精湛的研究。以后在清华和北大又多年讲授西方经济学和经济学说史等课程，在教学中深切感受到西方经济学对我国学术界的影响以及我国学术

界对西方经济学的看法的变化。在80年代，他曾多次撰文就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和我国现代化的关系进行阐述。他的不少见解是中肯的，也是深有启示的。

岱孙先生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新课题，它既是一个社会实践的问题，又是一个学术理论问题。从50年代初开始，我国学术界同西方经济学几乎处于隔绝状态，而主观上当时我们采取自我封闭的态度，拒绝了对西方经济学说的任何注意，这样，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我们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情况基本上是无知的。改革开放以后，情况变了，正如岱孙先生所说，“经过20多年的隔绝，外国经济学，对于一些人来说，变得十分陌生，陌生不免引起目眩；过去的自满也许变成自疑，由自疑而变为不加审别的推崇。”^①目眩和不加审别的推崇，在岱孙先生看来，尽管只不过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过渡现象，但对于我们自己的经济学的发展仍然是不利的，因此，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进行科学的分析。岱孙先生语重心长地写道：“我们既要承认外国经济学，在其近年的发展，在其推理分析、测算技术、管理手段等等方面有若干值得参考借镜之处，又不要盲目推崇，全盘搬套。”^②这是因为，“在经济学，或者说在整个社会科学范围里，社会经济制度是一个恒定的前提。……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在考虑分析经济现象的时候，不能不关切到作为这些现象基础的人和社会，从而不能不受到存在于不同社会中的不同道德伦理观念的影响、制约。”^③因此，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同物理学、天文学等是有区别的，在研究自然现象时不需要社会价值判断，而在研究经济现象时则不可能真正超脱于社会价值判断。这

① 《陈岱孙文集》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76页。

② 同上书，第876—877页。

③ 同上书，第877页。

正是岱孙先生长期以来一直坚持的看法。

岱孙先生接着认为，尽管现代西方经济学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不能成为我们研究、制定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却不等于说其中没有值得我们参考、借镜、利用的地方。他列举了五个方面的研究，认为它们对于促进我国现代化是有用的。这五个方面是：

1. 关于企业、事业的经营与管理的研究，包括企业组织、劳动管理、能源、原料的有效利用，工艺技术的改良、更新，产品品种、质量与市场的关系、成本计算、经济监督与审计等。

2. 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分析，例如投入产出分析等。

3. 微观经济学中关于商品的需求和供给、价格和销售量、竞争和垄断等有关市场机制的分析。

4. 数学方法的应用。

5. 西方经济学中有关现实经济的缺陷和问题的研究，例如资源耗竭、工业化和环境污染、生态平衡、分配失调、社会危机的分析等。

应当指出，在80年代初，在长期与西方经济学隔绝之后重新接触到西方经济学之际，岱孙先生高瞻远瞩，科学地阐明了我们对现代西方经济学应当采取的态度，使得不少人（包括从事经济学教学的教师、经济研究工作者、高等学校学生、政府工作人员、新闻工作者）从中受益。直到今天，当我们重新阅读岱孙先生当时撰写的这些文章时，仍能得到许多启示。

三

岱孙先生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始终在教育岗位上工作，教书育人。但他决不是从书本到书本、脱离现实经济的

人。他的一句名言在经济学界流传着，这就是：经济学是致用之学。^①

关于“经济学是致用之学”这一提法，岱孙先生先后在不同场合作了阐发。他说道：“古往今来，与经济学有关的理论，或者经济学本身，应该说是一种致用之学，而不是纸上谈兵。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来自实际，经过探讨，形成理论之后，又反过来指导实际。”^②

岱孙先生所说的“致用”，决不是那种急功近利的、狭隘的“学以致用”。他是反对所谓“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做法的。他认为这是把“经济学是致用之学”庸俗化的表现。在1981年撰写的《经济学是致用之学》一文中，他对“致用”二字作了十分精辟的解释。他写道：“从16世纪说起，迄于今日，古往今来的所有经济学家或学派的经济思想的产生、发展都离不开——‘用’字。先是，新的经济情况提出了待决的问题。然后经济学家就是针对这些经济现实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解、分析；对其有关事物的运动提出有论据的解说，形成了理论。这理论又反过来指导、促进、制控现实成为制定经济政策的依据和基础。”^③可见，“致用之学”指的是：经济学产生于实际而又要用于指导实际、变革实际，经济学不能成为“不食人间烟火”的、一无用处的学问，那样一来，经济学就会失去“存在的理由”。^④

岱孙先生的这些见解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发表的。在当时的情况下，确有一些人依然迷恋于过去那种从书本到书本，甚至从经典著作到经典著作的研究方式，而不了解近20年来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不了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经济形势的变化；同

①② 《陈岱孙文集》下卷，第860页。

③④ 同上书，第864页。

时，也有少数人在接触到现代西方经济学说之后，对于数量分析方法十分倾心，以为可以通过纯粹的数学推导而使经济学跻入“真正的科学”行列。岱孙先生认为这两种倾向都是不对的。他指出，书本当然要读，经典著作当然需要钻研，数学分析也无疑相当有用，但最要紧的是理论联系实际，是学以致用。所以他写道：“总之，我们认为经济学应该是致用之学。我们反对不切实际的一切空谈。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反对在我们这一学科中，只谈技术、操作而取消一切学理的相反极端。”^①

岱孙先生的这番话影响了许多人，特别是恢复高考制度之后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踏入经济类学科的大学生。

四

对“经济学是致用之学”的阐释必然涉及到西方经济学中规范经济学与实证经济学的划分问题。岱孙先生也在这个问题上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规范经济学（normative economics）和实证经济学（positive economics）是最近若干年来在西方经济学界盛行的两个名词。两者的区别在于是否把社会价值判断考虑在内。实证经济学是不考虑社会价值判断的，它企图答复“是什么”或“不是什么”的问题。规范经济学则考虑社会价值判断，它企图答复“应当是什么”或“不应当是什么”的问题。尽管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在许多场合是不可分的，即两者往往结合在一起，但由于彼此的侧重点不同，试图解释的问题不同，所使用的方法也不同，所以规范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有些经济学家主要

^① 《陈岱孙文集》下卷，第873页。

从事规范经济学研究,有些经济学家主要从事实证经济学研究,也有些经济学家兼而从事规范与实证两个方面的研究,这本是正常现象,并无高低上下之分。

然而,近年来在国外经济学界却存在这样一种偏见,即认为只有实证经济学才是真正的科学,而规范经济学则被排斥于科学的大门之外。这种偏见自 80 年代以来也对我国的经济学界发生某种影响,一些人误以为实证经济学不仅高于规范经济学,甚至只有实证分析才是经济学中唯一可以被使用的方法。岱孙先生认为这种偏见是有害的。他指出:“实证经济论者否定价值判断。但是,否定不等于它不存在。数学模型分析了各种变量之间关系,得到一个结果。但这结果是否符合社会实际,完全与社会判断无关吗?当然不是。”^①既然任何实证分析都离不开它所设定的社会经济前提条件,也都不可能把研究成果置于社会经济环境之外,可见社会价值判断是始终无法回避的现实。

岱孙先生以经济学说史上各种经济学说的产生与发展为例,详细说明了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是经济学的一贯原则。他指出,19 世纪以前,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以价值判断为出发点,古代希腊、罗马的经济思想家,中世纪的经济学家,古典学派的亚当·斯密、李嘉图等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判断,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当时是不分的。19 世纪后期,奥地利经济学家庞巴维克写了一本《资本实证论》,正式地提出了“实证论”这个字眼,但即使如此,书中还是采取逻辑分析而没有采取数学分析。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随着经济计量学的发展,实证分析才得到较大的进展。然而与此同时,规范分析也在继续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价值判断,对生态经济的研究,对福利制度的分析等等,都表现规范

^① 《陈岱孙文集》下卷,第 901 页。

经济学在研究中取得长足的进步。规范分析决没有消亡，也不会因为有人只推崇实证分析与排斥规范分析而销声匿迹。岱孙先生的结论十分清楚：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的结合，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要使经济学成为致用之学，既离不开实证分析，更离不开规范分析。

五

作为经济学说史的长期研究者，岱孙先生对于西方经济学中的“正宗”与“异端”之间的关系的分析是十分精彩的。在他以前，我们还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深刻的论述，国外经济学文献中没有，国内经济学文献中也没有。

岱孙先生写道：“所谓‘经济学正宗’是指那种‘既定体系的’或‘已被确认的’经济学说。这种学说已被认为是‘权威’，代表着‘正统’的观点。……‘异端’或‘外道’，则指那些与‘正统’相悖而行的学说。它们虽然也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也‘在思想形式下’表现了‘统治的物质关系’，但还不曾被公认为一种‘权威’，还不曾被看成是一种‘既定的’体系。它们被排斥于‘正统’观念之外。它们对‘经济学正宗’采取不同程度的‘批判’态度。”^①这一段论述从总体上说明了西方经济学中“正宗”与“异端”在社会上的地位，以及它们与统治阶级的思想之间的关系。

但“正宗”与“异端”在社会上的地位也可能改变。岱孙先生接着分析道：“‘正宗’和‘异端’或‘外道’不是固定不变的。‘异端’或‘外道’以经济学‘正宗’的‘叛逆者’的姿态出现，经过一段时间的论战，有的‘异端’或‘外道’或者掺入原来的

^① 《陈岱孙文集》下卷，第998页。

‘正宗’，终于与之合流，或者取代了原来的‘正宗’，成为新的‘正统观念’的代表。但有的‘异端’或‘外道’则始终处于原来的被排斥的地位。这是经济学说史上常见的现象。”^① 岱孙先生以丰富的经济学说史资料证实了这一论断。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凯恩斯经济学的兴起。

凯恩斯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在这以前，西方经济学的‘正宗’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经济理论。根据这一正统的西方经济理论，经济自动维持均衡被看成是天经地义的，因此政府不必对经济进行干预。凯恩斯关于政府干预的学说在其初出现时，是与马歇尔经济自由主义传统相悖的，因此它以“异端”或“外道”的姿态出现。但最终凯恩斯经济学取代了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正宗”地位，而成为新的“经济学正宗”。岱孙先生就此写道：这一例子表明，“在一定的条件下，‘正宗’与‘异端’或‘外道’可以互相转化，绝对的‘正宗’是不存在的。”^②

岱孙先生的上述分析对于我们理解西方经济学说的发展非常有用。既然“正宗”与“异端”可以相互转化，既然在西方经济学中无论“正宗”还是“异端”都表现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思想形式，那么西方经济学说发展的脉络就十分清楚了。在西欧，中世纪的“正宗”是经院派经济思想，中世纪晚期的重商主义学说则是一种“异端”，但随着历史的演进，重商主义终于从“异端”变成了“正宗”。重商主义学说大约盛行了200年。到了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在重商主义仍然占着“正宗”地位的同时，古典经济学开始出现，这时，古典经济学也是以“异端”的姿态向重

① 《陈岱孙文集》下卷，第998—999页。

② 同上书，第1001页。

商主义这一“经济学正宗”挑战的。终于到了19世纪初，古典经济学又成为新的“正宗”。经济自由主义学说大约在经济学论坛上占据了100年稍多一些的“正宗”地位，此后，正如前面所说的，凯恩斯经济学以“异端”形式出现，并最后成了新的“正宗”。从经济学说史上的这些演变，我们可以对当代西方经济学中的各派论争的来龙去脉有清晰的了解。岱孙先生的论述无疑给了我们一把宝贵的钥匙。

六

岱孙先生以97岁高龄离我们而去。当我们在他家里向他的遗像鞠躬致哀之际，过去几十年的师生之情久久不能使我们平静。家里的摆设依旧，那些陈旧的家具已相伴他好几十年了。书桌上还堆放着手头常用的书籍。外地学生们寄来的书信也放在那里，大概是准备回信而还没有动笔。桌上还有素不相识的年轻人寄来的稿件，想请他审阅。房间里静得出奇，一切都同往日一样，就好像他老人家外出开会去了。

40多年前，当我在北京大学经济系三年级刚听他讲课时，我还只是20岁刚出头的青年学生。岱孙先生整整长我30岁，他那时也只是50岁刚过两三年。风风雨雨，岁月如梭。不平静的1957—1959年，动荡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改革开放以后的18年，我们都在一起。我的两个孩子，都曾受教于他。他送给他们两人的著作，他们都珍藏着。1979年春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才三个多月，我陪他去杭州开会，为期一个月，同住在一个房间内，朝夕相处。他随身带的是六朝诗选，一有空，就翻开来阅读。他没有睡午觉的习惯，中午我睡了，他就读诗消遣。傍晚时，我们一起散步，边谈边笑，谁都不会料到他当时已经79岁了。如

果岱孙先生还健在，回忆那些年的经历，总会感觉到欣慰，因为那是些难忘的日子。如今岱孙先生已同我们永别，对往事的回忆所给予我们的，只是伤感、悲痛。

我有幸在1985—1987年间同岱孙先生合开过两门课程，一是“西方经济学名著选读”，另一是“国际金融学说专题”，选课的都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研究生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研究生部的研究生。岱孙先生自己讲凯恩斯以前的部分，而把凯恩斯和凯恩斯以后的部分让给我来讲。我每次讲授时，他都同选课的学生一起听。他也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作些简要的记录，课后同我讨论，指出有哪些不足或在下一次讲授时应当注意的地方，那时他已80多岁了。他那种一丝不苟的精神，令我非常感动。我常想，他老人家如此德高望重，而在对学生负责方面却仍同几十年前我做学生时那样，我们这些后辈还有什么理由不认真备课，不认真授课呢？

我同岱孙先生合作的一项科研成果，是“七五”时期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和国家教委文科博士点科学研究项目的产品《国际金融学说史》，全书共60余万字，分为36章。岱孙先生和我共同主编，1991年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定稿时，他对某些术语的译名反复推敲。校对清样时，他亲自过目，某些地方用铅笔打上记号，批道“以宁再斟酌”。一位90岁的老人这样细心、严谨、求实，怎不使我们肃然起敬？《国际金融学说史》一书被认为填补了国内外经济学说史研究领域中的一块空白，这也是岱孙先生晚年最高兴的事情之一。担任各章撰写的，包括我在内，全都是岱孙先生的弟子。正如该书前言的末尾所写：“本书自1987年拟定写作提纲开始，历时4年，于1990年全部定稿，适逢陈岱孙先生九十寿辰，本书的完成也可看作他的学生们对这位受尊敬的老师的祝贺。”

岱孙先生终于走了。学生们都在想，要是再过三年，他仍健

在，让我们为他举行百岁寿辰庆典，那该多好啊！这已经不可能了。但岱孙先生的身教言教，将使他所有的学生受益无穷。丹心耿耿，春雨潇潇，天地宽阔，师道长存。安息吧，尊敬的岱老！

（原载《经济研究》1997年第9期）

前 言

陈岱孙老师的学术历程与成就

晏智杰

(北京大学教授)

今天，当我提笔为陈岱孙恩师这部著作作序时，这些天来稍显平复的怀念和惋惜之情再次涌上心头。这部书是岱老生前指导我们编撰的，但他终于没能看到他所关注的这部书的问世。1997年7月，在他病重住进北京医院的那些日子里，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但躺在病床上的他还是打起精神，仔细听取我对该书编撰进展情况的汇报。得知已取得预期进展时，老人消瘦的脸上流露出满意的笑容。当时我们曾谈及他在50年代中期写作的那部《经济学说史》讲义，当他听完我对这份具有科学意义，然而“时运不佳”而横遭批判，迄今未能面世，甚至已经很难寻觅的历史材料的评价时，岱老的精神为之一振，那眼光分明是对我的见解的首肯，接着还伸出两个手指比划着说，这部讲义他那里还有，他最近在自己的书房里找到了，不过不是我说的一本而是两本。当我告知岱老，我手头的那部“一卷本”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济学院图书室一位工作人员私下给我的时，岱老显得很欣慰。看到岱老病重，又是那样重视和关切本书的编撰，我那些天冒着空前的酷暑，日夜兼程，拼命加快编撰进度，希冀能让岱老看到该书的完成。哪里想得到他老人家竟走得这样快、这样急。

岱老为别人的书写了那么多序言，可是轮到大家为他出书，要他自己撰序时，一向谦逊的他就却之再三了。记得1989年为岱老出版《陈岱孙文集》时，我曾建议请其他名人作序，岱老未表赞成，说是不要麻烦别人了；我提议岱老写一自序，岱老也说不写了——其中的原由我是理解的。关于这一点，岱老称之为他的一个“思想问题”，在后来他为《陈岱孙学术论著自选集》的序文中有明确和详细的说明，因为是自选集，他这篇序言看来是不能不写了；可我作为上述《文集》的编者觉得有话要说，于是斗胆写了一篇介绍性的文字拿给岱老过目，未曾想岱老竟表示可以之为序，我无论如何不能也不该答应，于是就作了《文集》卷首的《编者前言》。这其实也就是我们这些学生在大师身后为他出书也不敢为之作序的由来。岱老生前过目的那篇《编者前言》，其实也就是我今天想说的话，但要作必要的修改和补充。

岱老作为我国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和教育家，久已蜚声海内外。他不仅学识渊博，治学严谨，教学有术，桃李满天下，而且品德高尚，堪称楷模。更为可贵的是，作为本世纪同龄人，岱老历经了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动，而能跟随时代不断前进。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下，他都坚持着为国家民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立场，并随时代前进而赋予了新的内容。人们有理由相信，将岱老在这样长久时期中发表的思想成果的精品结集出版，定会对我国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产生良好影响。而在岱老去世的今天，这样做更有其不同寻常的纪念意义。

本书作品是从岱老1926年哈佛大学博士论文以来70年间的论文和著作中精选出来的，它集中概括和反映了岱老多年辛勤耕耘的主要成果；它像一幅历史长卷，真实地展现了陈岱孙教授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思想历程。岱老不是著作等身之人，公开发表和

出版的著述大约 150 万字，另有已经写成而未及发表的文字约 50 万字。这固然同岱老治学严谨、惜墨如金有关，但主要还是客观条件和环境使然。要不然就难以理解岱老在他进入耄耋之年还能写出那么多的经典之作。而在损害岱老学术研究的诸多事件中，最使岱老“耿耿于怀”、视为不可弥补的损失者，莫过于日寇侵占清华园，使他关于各国财政制度比较的研究成果毁于一旦；还有就是从 50 年代后期到“文化大革命”前后 20 年间不得不保持的“学术沉默”。但我们要说，也许正因为如此，使得人们更加真切地看到一个科学家的爱国之情和最可宝贵的科学品格，从而更加珍惜他已有的科学成果，特别是他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发出的呐喊，以及在“劫后余生”时喷涌而出的心声。

说到陈岱孙教授的学术成就及学术思想的发展，人们会很自然地想到他那有名望的家世和他本人青少年时期出类拔萃的学历。正是这书香门第之家和中西文化的系统教育与熏陶，为他后来的事业和成就奠定了基础。陈岱孙原名陈总，1900 年 10 月 20 日（农历闰八月二十七日）生于福建闽侯一个“书香门第”之家，他的伯祖父就是清末宣统皇帝的帝师陈宝琛。陈岱孙六岁入私塾读线装书，1915 年秋考入福州市鹤岭英华中学，1918 年夏赴上海考取了清华学堂高等科的三年级插班生，1920 年夏毕业后被录取为公费留美生，赴美国深造。他先入美国威斯康星州立大学经济系，1922 年 6 月毕业，同年秋慕名考入哈佛大学研究院，1924 年 6 月被授予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26 年获该校哲学博士学位。1926 年 4 月赴欧洲大陆游学，先后在巴黎大学和大英博物馆进行学习和研究。1926 年底离开巴黎经马赛乘海轮回国，1927 年 2 月抵沪，旋即奔赴阔别七年的家乡。

从读私塾到取得博士学位前后 20 年，陈岱孙系统地接受了中

西文化的教育和熏陶，为他日后的事业奠定了深厚和牢固的基础。勤奋学习是他这一时期生活的主要内容和显著特点，以致在时隔大半个世纪之后，回首往事时，陈岱孙对少时躲在家里装满书籍的藏书阁楼浏览历史和小说等各类书籍的岁月仍记忆犹新，对留学哈佛大学时有幸在图书馆获一单人小隔间，专心致志、如饥似渴地吮吸人类知识营养的经历仍无限神往。

爱学习必爱老师。陈岱孙对引他进入知识宝库、教导他做人的道理的启蒙老师尤其怀有深深的敬意和感激之情。读过《私熟内外——童年学习生活片断》一文，体味一下少年陈岱孙的老师题在团扇上赠给他的那首他“一直记着、不敢忘”的涵义深远的诗，读者就不难理解和领悟到，陈岱孙一生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始终进取的精神，不是没有来历的。诗曰：

本是龙门诤李膺，虬枝得所气休矜，

人间饮啄原前定，不露聪明即寿徵。

如果说幼年入私塾读线装书是家庭的必然要求和安排，躲进阁楼“乱看书”是兴趣所至，那么，当陈岱孙迈出家门，来到上海和北京以后，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的种种事件，则使他对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有了更多的思考，青年陈岱孙的思想渐趋成熟了。1918年夏陈岱孙赴沪投考清华学堂期间，在黄埔江畔公园门前撞见“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牌子时的痛苦感受是他永远不能忘却的。“我斗然地止步了”，陈岱孙回忆说，“瞪着这牌子，只觉得似乎全身的血都涌向头部。在这牌子前站多久才透过气来，我不知道。最后，我掉头走回客店，嗒然若丧，第二天乘船回家。我们民族遭到这样凌辱创伤，对一个青年来说，是个刺心刻骨的打击。”次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伟大反帝爱国“五四运动”，又给正在清华学堂就读的陈岱孙上了深刻的一课。他与其他同学一起参加了游行、请愿和宣传等活动，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五四”爱